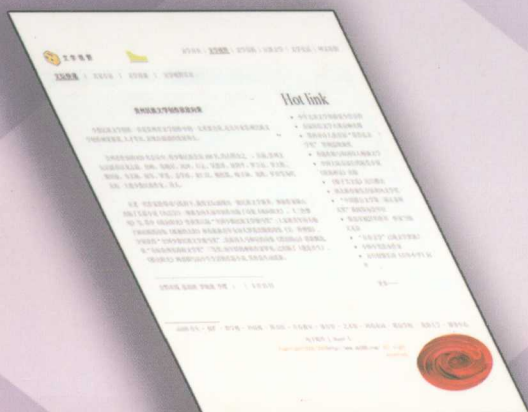


晚情丛书



如是集

尹伯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如是集

出版说明

如是集

尹伯生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是集/尹伯生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8

ISBN7 - 221 - 06661 - 2

I. 如... II. 尹...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4927 号

如是集

著 作 人:尹伯生

责任编辑:王才禹

封面设计:王艳梅

版式设计:王才禹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字 数:215 千字

印 张:9.125

印 数:100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221 - 06661 - 2/I · 1386

定 价:14.00 元

出版说明

这套丛书,名为“晚情”,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书的作者,都是年逾花甲乃至古稀的老作家、老艺术家,书中的文字作品或美术作品,凝聚着他们多年辛勤耕耘于文坛艺苑的一往深情——是为晚年之情;二是对贵州省文联而言,为这些老作家、老艺术家出版一本作品集,是多年言而未果的心愿,如今终于如愿以偿,虽然时间晚了一些——是为晚到之情。

因此,要特别感谢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是他们的真诚关心和大力支持,并从有限的“文化事业建设费”中挤出经费予以资助,这套“晚情”丛书才得以出版。

应该说明的是,丛书的作者们,都是贵州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物,也都是先后在贵州省文联工作多年的老人。当年,他们孜孜不倦地为贵州文艺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今天,他们手中的笔仍未停息,仍在为贵州文化事业的建设而劳作。真是晚情不息,壮心不已!

谨以此丛书,在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50周年之际,为贵州文化的繁荣昌盛祝福!

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03年6月

目 录

目 录

文艺大众化琐谈	(3)
读稿拾零	(7)
《拾零》续篇	(11)
几年来的获奖短篇小说欣赏	(14)
漫谈文艺批评写作	(23)
寄小作者(三则)	(26)
重新认识生活 重新认识自我	(31)
悠悠十年看贵州	(35)
文艺发展的继承性	(40)
试谈胡学文的创作	(45)
在探求和创造中前进	(53)
奇不失真 新不离本	(60)
选择最佳的“切入”角度	(63)
一项重要的文化积累	(67)

品 评

漫评中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	(75)
为了明天	(80)
充满诗情画意的奋进曲	(87)
烙印	(92)

漫评《帷幕后面》	(97)
令人欣慰的花束	(100)
何必是爱情	(104)
看《宝灯》谈直感	(106)
让读者在艺术享受中得到启迪	(108)
爱的召唤	(111)
赏析《将进酒》	(114)
心灵的感召	(116)
选择最佳角度	(118)
真切·鲜明·动人	(121)
我们在期待	(123)

赏 析

逻辑推理的成功与失败	(129)
哀婉的歌	(132)
生命的“奥秘”	(135)
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137)
米里哀主教的银烛台	(139)
凶狠的鹰犬 完美的形象	(142)

专 论

色彩斑斓的 20 世纪外国文学	(147)
苏轼和他的散文	(163)

杂 说

且说大胆	(171)
隧道口的光亮	(173)
哪有不映照物象的镜子	(175)

这难道正常么？	(177)
漫谈小小说	(180)
灯下絮语	(182)
众星闪烁	(184)
小议雅俗共赏	(188)
祝愿	(190)

散 记

江边	(195)
高原奇葩	(199)
寻踪寄语	(202)
我愿化作一股春风	(207)
文苑逸事	(208)
留在西双版纳的梦	(215)
拉萨具象	(224)

纪 实

民主卫士	(231)
逆暴风而进的小鸟	(247)
青春是应当发光的	(264)
把握契机 喜创佳绩	(275)
后 记	(281)

文艺大众化琐谈

当

议

《山花》二月份上发表的“文艺大众化”一文，在反对形式主义地搞大众化当作“仅仅是语言问题”和形式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大众化更主要也是根本的方面是思想内容即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论点，认为是否表现了“革命群众的情緒、理想、生活”，是衡量文艺作品大众化的根本尺度。我认为，文章的主意是好的，但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所谓“革命群众的情緒、理想、生活”，是对一切文艺作品总的原则要求，用普遍的要求，代替对大众化问题的具体分析，尽管在理论上似乎也是正确的，但却未免失之片面，对具体解决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会产生切实有效的作用。

什么是文艺的大众化呢？毛主席明确地指示说：“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群众同意你和赞许你，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就是说，文艺大众化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才能真实地反映群众生活，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什么是工农兵自己‘所便于接受和喜欢的’，从而才能创作出真正为群众所欢迎的大众化或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略谈“大众化”》一文的作者，虽然在论述中也涉及到了作者的思想问题，但由于着眼点的不同，我对文章的一些论点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以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作为检验大众化的根本尺度，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事实上，具有积极思想内容的作品，

文艺大众化琐谈

《山花》二月号上发表的《略谈‘大众化’》一文，在反对形式主义地把大众化当作“仅只是语言问题和形式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大众化更重要也最根本的方面是思想内容即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论点，认为是否表现了“革命群众的情绪、理想、生活”，是检验文艺作品大众化的根本尺度。应该说，文章的立意是好的，但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认为反映“革命群众的情绪、理想、生活”，是对一切社会主义新文艺作品的总的原则要求。用普遍的要求，代替对大众化问题的具体分析，尽管在理论上似乎也是正确的，但却未免失之片面，对具体解决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会产生切实有效的作用。

什么是文艺的大众化呢？毛主席明确地指示说：“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是解决文艺大众化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才能真正地了解什么是“工农兵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什么是工农自己“所便于接受的”形式，从而才能创作出真正为群众所欢迎的大众化或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略谈‘大众化’》一文的作者，虽然在论述中也涉及到了作者的思想问题，但由于着眼点的不同，我对文章的某些论点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以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作为检验大众化的根本尺度，是不够妥帖的。因为事实上，具有积极思想内容的作品，不

见得就是大众化的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里面关系到作品的艺术形式问题，也关系到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问题。文艺创作是客观现实通过作者主观认识的曲折反映，只有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才能写出具有积极思想内容的作品。因此，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是首先从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自觉地改造思想，努力争取做一个彻底革命者入手，而仅从追求革命思想内容的主观愿望出发，从概念和政策条文出发来进行创作，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即使有时也有可能写出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作品，但绝不可能真正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真正解决自己创作的大众化问题。有些作品所描写的工农群众，“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如果不从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和改造自己思想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即使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着眼去解决自己创作的大众化，也不见得就能完全避免得了产生形式主义的危险。诚然，《略谈‘大众化’》一文的作者，在谈到大众化的作品必须表现革命群众的情绪、理想、生活时，也谈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与群众打成一片，但由于是着重从解决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角度出发，没有把文艺工作者在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改造思想这一解决大众化的根本关键十分明确地强调出来。因而就不能不使人感到：似乎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目的，仅仅是，或者主要是为了去寻找所谓“积极的思想主题”，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略谈‘大众化’》一文的作者，对实现文艺大众化应该特别注意解决艺术形式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我们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但我们在承认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内容起着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形式对内容也起着积极的反作用。不承认形式的这种积极的反作用，看不到形式能更好地表现内容，有助于将内容明白生动地表达出来，仅仅一般地把形式看成是内容的消极表现手段，不恰当地以

内容的要求来代替对形式的要求,实际是否定了内容和形式的区别,把内容降低到了形式的范畴。这种非辩证的观点,看似重视内容,实际倒真正有悖于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大众化归根到底是一个新文艺的普及问题。“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虽然也有内容的深度问题在内,但不是指内容的肤浅,而是要求作者将工农群众所关心、所需要的东西,用比较简单明了、浅显易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显然,它不止是要求作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民族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求作者,真切地了解,并努力适应和进一步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欣赏兴趣和接受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作品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作者不具有革命的观点,不认真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是不能够做好的。

第三,旧的文艺作品对群众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群众的欣赏习惯正是在它的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目前,一些封建的、反动的旧文艺作品之所以还能有一定市场,一方面固然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另方面也是由于利用了这种影响。因此从新文艺应该通过怎样的斗争,以不断扩大影响、稳定地占领阵地这一角度来说,我以为着重地强调一下文艺工作者,必须更多地注意批判地继承为群众所习惯的传统艺术形式,创造为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以解决农村“没有新书看”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农村目前会存在“没有新书看”的现象呢?我认为主要不在于我们的新书出版和发行得少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数众多的新书中,真正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所接受的作品,还不够多。而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部分作者还没有认真研究工农群众的传统欣赏习惯,还不善于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深入浅出地表现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因而也就很难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这一点,《记一次‘关于小说在农村的调查’》^(注)这篇文章谈得非常中肯。文章指出:如果作者不注意适应群众的

欣赏习惯,那末作品“即使写得比较深刻,但由于写法上离群众的习惯较远,语言不够群众化,也会限制更多的农村读者接受。这里首先是一个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问题,自然也有逐步提高、扩大群众的欣赏趣味的问题,这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这段话,对探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它所反映的、当前广大农村读者的情况,说明了在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着重注意艺术形式,有着它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见《文艺报》1963年2期

读 稿 拾 零

暖风微微,万物复苏,春回大地,草木欣欣向荣。勤培土,应浇水,须剪枝,还施肥。愿艺苑百花,绽芽孕蕾,竞开粉面,含翠吐芳,争奇斗妍;妆点祖国山河,丰富文化生活,满足人民需要;贬斥伪恶丑,颂赞真善美,不断涌现一批批真正能舒胸臆,动肺腑,拨心弦,撩情意,悦目,冶性情的艺术品来。

坚持“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创作,提高创作质量,实为当务之急。

提高质量,当然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然而,文艺作品的思想必须通过其艺术感染力量表达出来。我们评价一部已经成为社会产品的文艺作品,常常首先分析其思想主题,衡量其社会价值,方次及之于艺术成就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一个作者来说,在他进入创作过程时,却应该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一切创作来源于生活,作者无论撷取任何生活素材,刻划何种艺术形象,创作各类形式作品,只要他是忠于现实的,反映人民愿望的,就必定要展现一定思想内容,透示某种社会意义。当前,虽然批判了“四人帮”的“主题先行论”,而那种图解式的概念化作品仍层出不穷!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作者在进入创作过程时,仍然不敢把生活和思想,艺术和政治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既然是进行艺术创作,就必须遵循艺术规律,首先是为了创造艺术品。事实上,也只有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才能真正发挥一定的思想教育和社会认识作用。所谓思想开掘要深,我认为绝不是悬空地凭主观愿望去任意拔高思想主题,而取决于作者本人在社会实践中,对生活、

对社会的感受程度,认识高度和揭示深度。这就是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能以小见大,而失败之作则往往是克里空的根本原因。艺术品就必须以艺术取胜。一切来源于生活,忠实反映现实,符合人民愿望的艺术品才具有无限生命力。

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里,无论身居工业、农业或其他任何行业,人们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甚至思想方式等等,同一性是主要的。然而,生活在辽阔祖国大地的九亿人民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们有千差万别的性格特征,各自的悲欢离合,不同的喜怒哀乐,总之,是具有极为生动鲜明的个性或特殊性的。文艺创作必须反映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塑造各种鲜明丰满的人物个性。而许多文学青年却常常只注意到生活的同一性,在写作中或是热衷于摸行市,赶浪头,见到报刊某个时期发表哪方面的作品,就蜂拥而上,于是,写出来的东西就往往大同小异,平庸一般;或是总感自己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单调枯燥,于人于事,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或是囿于成规,屈从权势,虑及得失,即使不蓄意粉饰,至少也有意规避现实,于是势必走向脱离生活,违背现实,冥思苦索,凭空捏造,更有甚者,则追求荒诞不经,低级趣味的穷途末路。我认为,进行艺术创作,必须坚持从生活中来。作者要勇于打破一切精神枷锁,敢于面对现实,用全部感情去感受生活;要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真正看作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体验他们的悲欢离合,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只有作家有了实感,动了真情,才能透过社会生活的同一性,把握人们内心世界的多样性、特殊性,理解人物千差万别的个性。从而才能突破文艺创作的一般化,克服雷同化,写出具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感人作品。

这里自然要涉及艺术的典型化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既广又深的专门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但可以表明一点,我认为过去有关艺术典型化的一般定义和流行概念,是值得重新认真

探讨的。总之,不恰当地过分强调同一性,普遍性,比较地忽视了个性、特殊性,在艺术创作中就必然产生一般化、雷同化的恶果。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我们应该重新认识。

艺术作品必须具有艺术感染力,作者进行创作必须动感情,这主要是从艺术创作的内容方面说的,然而,内容和形式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几乎并不存在先后、主次之分。既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也绝无不表达任何内容的纯粹形式。作为有形的艺术作品,从读者和观众的直观来看,能否令人产生美感,是否吸引读者和观众的,倒往往首先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

艺术形式涉及的方面很多,不仅限于通常所说的艺术体裁,还包括了文艺创作的全部表现手法和技巧。这里,我只谈一个文学创作的语言技巧问题。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当前,却存在一大怪现象,文学作品根本不讲究语言。就是偶尔谈到艺术技巧时,也未能把语言问题提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于是乎,在不少来稿中,或是枯燥无味,苍白无力;或是陈词滥调,废话连篇;或是搔首弄姿,矫揉造作;或是堆砌生造,不知所云;或是故作高深,佶屈聱牙……这岂能给人美感,只实足令人败味。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但概而言之,可谓之无知。我们对那种由于割裂内容和形式的形而上学观点,而有意贬低艺术形式,忽视语言技巧的错误偏向姑且不论。这里必须强调的只是语言技巧绝非所谓雕虫小技。历来,中外文学史常把著名作家称为语言大师,普希金的文学语言丰富和发展了俄罗斯语言就是最好的例证。文学青年必须在语言上下大功夫,这是进行文学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功。要从中外古典名著中学习精辟形象的语言,也要大量积累提炼人民群众的生动丰富口语。

学习语言,不只是记住几个词汇,而是要深刻理解,认真掌握,充分发挥语言的表现力。这就需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培养锻炼一种能辟里入微的运用语言技巧的硬工夫。鲁迅只用了二千七